



Canadian TCSL Association
加 拿 大 中 文 教 学 学 会

**The 6th Canada-China TCSL Conference
Collection of Papers**

5.

**从一组称谓词的使用看在日本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导入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troduction in TCSL in Japan
Based on the Usage of a Group of Addressing Terms**

梁晓虹教授, 日本南山大学(Nanzan University, Japan)

摘要: 本文以“先生”与“老师”的泛化、“经理”与“社长”的混乱、“爱人”的误区、“姑”“娘”倒置、“兄”“姐”对象等称谓词的使用为例, 论述在文化“同型”, 语言“同文”的日本, 教授汉语时文化背景导入的重要性。

一.

日本作为中国一水相隔之邻邦, 自从两国有文化交流以来, 就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无论是传统的孔孟之学, 还是外来的佛教, 都曾东渡扶桑, 来到日本, 并逐渐流传发展, 最后渗透进日本文化的核心。而汉字的输入, 则是汉民族文化东渡的结晶。文化“同型”, 语言“同文”的结果, 使得日本人在学习汉语时较其他国家的习得者来说, 相对能较易并较快地理解并掌握。然而, 我们又不得不指出的是: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毕竟有很大区别。而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经历了从旧到新, 从文革浩劫到改革开放, 从政治体系到思想领域所产生大发展、大变化, 这一切都会在汉语, 尤其是汉语词汇中留下深深的印迹。而汉字进入日语后, 被用来作为大和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重要部分, 自不同于她在“娘家”之原貌。汉语和日语, 作为两国各自文化的载体, 随着社会的进程, 自也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发展与变化。这种发展与变化当然在词汇上反映得最为突

出。所以，尽管日语中有许多词（指汉字词）与汉语词同属一“祖”，但从意义发展线索及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来看，往往难以等同。所以在日本教授汉语时，涉及到这部分内容时，就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词义对译解释，而需要文化背景的导入。也就是在词汇教学中融入文化内涵，使学生的视野开阔起来。这样才能帮助习得者在语言交际实践中更好地掌握和表达汉语，起到融会贯通的作用。

称谓词是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体现之一。因为“称谓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际的需要，称谓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在这种发展变化中也反映着民族文化变革的脉络。”ⁱ称谓词是词汇系统中整个语义表现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特别是“社会关系”称谓，间接，有时甚至是直接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进程。中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由于封建政治的统治和宗法制度的约束，汉语称谓词也就带有森严的等级色彩，集中体现于两大方面：一是以君、臣、民为脉络的封建国家系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称谓；二则为以父子、夫妇为中心的家族结构所建构的亲属关系称谓。一本《称谓录》，足可以反映这一切。ⁱⁱ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曾先后发生过几次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自然在汉语词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从称谓词的角度看，主要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由等级性变为平等性。新中国成立后（也可向前延伸到解放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一批被认为属于剥削阶级的旧称谓词废弃不用，典型的如“老爷”、“官人”、“夫人”、“太太”、“少爷”、“小姐”等亲属称谓以及“老爷”、“大人”、“长官”、“剃头的”、“拉车的”、“窑姐儿”等旧的社会关系称谓。新社会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体现在称谓词上，夫妻之间互称“爱人”，人与人之间通称“同志”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的改变，也反映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变化。第二次是从单一化趋向多元化。在差不多近三十年中，汉语中的称谓，主要指社会关系称谓，因社会关系的简单而呈单一性。然随着改革开放门户的敞

开，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经济的腾飞，中国社会分层出现多元化的特点。多元化的交际圈的形成，也就促使汉语称谓词趋向多元化。除一些旧称呼或“回归”，或“复辟”以外，如“先生”、“小姐”等，有一些称谓词自身也呈多元化，如“老板”、“同志”等，还有一些旧称谓词“旧瓶换新酒”，被赋予新义，如“老总”等，而随着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现象，新称谓也层出不穷。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社会文化背景之同异，自然在语言上有所体现，反映在称谓词上也极为明显。另外，日语中的一些称谓词虽源自汉语，或用汉字表示，但随着中日两国语言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在汉语教学中，教授称谓词时，有两种方法：一. 简单对译授受。如告诉学生，“爱人”可指称夫妇双方，与日语“爱人”指情妇、情夫不同；二. 在教授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适当进行文化背景的导入，让学生在习得语词的同时也能了解有关称谓词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准确把握有关称谓词的用法，并能在实际运用中，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而灵活运用，把握好开口交际的第一关。

二.

我们拟以现代汉语中一组常用称谓词为例来论述这一观点。

1. “先生”与“老师”的泛化

“先生”在日语中基本保持源自汉语之古义，用以称呼教师和医生等知识阶层，属于一种口语尊称。汉语中“先生”历史悠久，词义丰富。但1949年以后，因旧时被称以“先生”的相面、算卦、看风水等为行业的人逐渐减少，且因为“同志”的大普及，特别是受十年文革斯文扫地的影响，此词一度使用范围缩小。而十年动乱之后，随着学校教育逐步恢复正常并发展，此词又泛活力。既可用于对知识阶层的尊称，也可泛化而作为对男子的敬称，而“先生”的另一源于古汉语的义项——丈夫，也受港台语言的影响而复归，并颇为流行。笔者曾调查过著名女作家张洁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发现其中称丈夫之处，皆用“先生”。

日语中也有“老师”一词，但多指老年教师，即其“老”不为前缀，有实义。而更多的时候，“老师”是佛教界对长老、法师等高僧的尊称。汉语中“老师”也是自古就有的称谓词，可尊称年老辈尊的传授学术的人，也可泛称传授文化、技艺者，还可作对僧侣的尊称。但作为对教师的尊称，却是现代汉语特有的用法。然而，近年来本只用于教育界的“老师”，却多有泛化。许多与教师职业无关者，如演艺界、文化界皆喜用“老师”一称。尽管有些被称者，自身文化水准或许很低，也难以承担“传道、受业、解惑”¹⁴之责，但不可否认此称因多喜用而已被泛化之现象。

“先生”与“老师”汉日自古皆有，日本学生学习理解本不难，然其泛化现象却颇不易掌握。一般教科书“老师”在前，“先生”在后。在讲解时，开始可分别结合日语中这两个称谓词的基本用法，以加深理解，但到一定的时候，还要将其发展脉络，特别是当前的泛化现象也告诉学生。这就需要文化背景的导入，告诉他们为什么？否则就会因日语的影响，虽一般能用，但不会在现实交际场合灵活运用。

2. “小姐”与“同志”的尴尬

汉语中“小姐”之旧称使用较窄，宋元时用作对地位低下女子的称呼，后转为对未婚女子的敬称，一般用于上层社会。在中国大陆地区，“小姐”曾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称呼而几乎消失。然近年来，“小姐”也和“先生”一样，又复归并流行开去。盖因“小姐”本用于未婚女子，给人以青春可爱之感觉，故造成了“小姐”的流行，以至其年龄段越来越模糊，一度成为年轻女性，有时甚至包括中年女性之代称。八十年代以后的日本教科书中，“小姐”出现频率很高，一般有关住宿、吃饭、旅游、购物等内容皆会出现这一称呼。日本学生也很能接受这一称呼。但是，近年来“小姐”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含有贬义，指陪酒、陪舞、卖淫的年轻女性。所以这个曾经通行一时的对年轻女性的称谓，似乎又带上了某些暧昧的含义，变得不受欢迎，以至于要惹人白眼，遭人摒弃了。然而教科书，包括词典一般不会有此内容。所以如何避免日本学生去中国某些地区旅游、吃饭而

与女服务员对话时，在称呼上不至于引起误会，就需要我们在教授此词时，除了一般讲解，还应该给学生分析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人文等因素，使学生能清楚了解此称呼的语义受社会变迁之影响所具有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从而准确使用，不致有误。

“同志”自古就有，因表示志趣、志向相同而作名词。郑玄注《周礼·地官·大司徒》之“五曰联朋友”曰：“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后多用于称为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人。如19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而共产党与国民党皆各称其党内人士为“同志”。1949年以后，“同志”的指称范围得以扩展，成为最流行的通称。有“男同志”“女同志”，还有“老同志”“小同志”，甚至还可以加上其他称呼作为修饰，以区分其类别，如“解放军同志”“服务员同志”“司机同志”等。但七十年代中期，从北京地区开始，“师傅”一词从行业称谓转入泛称称谓，一度“同志”作为泛称的地位明显受损；继此之后，因“先生”“小姐”等称呼的复用及流行，“同志”的使用无形就缩小了范围。加之过去“同志”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难以与实际社会环境相适应，故“同志”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也就逐渐趋于低势。近年来，受港台的影响，“同志”甚至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某种意义上含有贬义。词义的这种变化与发展，对汉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日语也有“同志”一称，与汉语本义相同，故日本人从字面上理解并不难。然无论是从过去政治意义颇为浓厚的泛称，到后来使用范围的缩小，以至现今有些暧昧的指称同性恋者，这对日本学生来说都是难点。但“同志”这个称呼，某些交际场合也确实还在使用，所以教科书上还不时出现。这也给我们带来了难题。笔者认为，关于“同志”，不必让学生学会使用。因为外国人在中国，完全可不用这个称呼。但是要把其词义的发展线索告诉学生，并结合“先生”“小姐”等，进行时代背景与交际环境的说明，使学生了解“同志”所走过的历程，也能明白“先生”等的交际范围，在多元化的社会分层中，准确把握，灵活运用。

3. “师傅”的局限

在汉语中，此词除了指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以外，还主要用于尊称具有某种技艺者，如“木匠师傅”“裁缝师傅”等。但从七十年代中期，因为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后大量进入工厂、商店就业，按照行业规矩，他们都要拜师学艺，故“师傅”一称重新流行。他们对一切比他们年长的工人都称“师傅”，^{vi}有时即使比自己年轻也如此称。这样，既有来自对“师傅”本义的亲切与尊重，更多的是因为受自从文革开始特别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时代政治背景的影响。扩而广之，“师傅”这个称谓就用到了社会上，无论是购物还是问路，都可开口先称“师傅”，而使得“同志”的泛称地位明显受损。但因为“师傅”一称的行业意味毕竟比较浓，所以并未长期普及下去。如今“师傅”仍可作泛称用，但其指称范围是有局限的，一般用以称感觉上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人，与“先生”曾泛称知识分子相似。然而日本出版的某些教科书将“师傅”解释成与“同志”相当的泛称。如果授课者不再进行相关的补充说明，那么学生就无法区别“师傅”与“同志”、“先生”等的异同，实际交际中就会出现失误。特别是因为日语中有一个与汉语“师傅”可对译的汉字词“师匠”，故日本学生不难理解“师傅”之本义，困难的是本义以外的东西，故文化背景的导入尤为重要。

4. “经理”与“社长”的混乱

“经理”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可谓新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职衔称谓之一，甚至有使用过滥，名不符实之现象。日语中也有“经理”一词，但却只是经营管理之意。日语的“经理”并不表示为某企业单位的负责人，而只是某项业务的具体经办者，相当于汉语的“业务员”。所以如果中国人的名片上，标上“经理”字样，或许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但给日本人递名片时，却往往并不一定能达到如期受尊重的效果。这是由两种语言中“经理”所具差异而致。

“社长”在日语中就像汉语里的“经理”一样使用频率极高。汉语也有“社长”一词，但指称范围却小得多，而且具有某种特定含义，如曾经特指人民公社的负责人，也可指某些社团的负责人，如“诗社”，当然也可指以“社”结尾的单位

负责人，如“出版社社长”。其实，无论中日，“社长”一词都是在“社”之后加上后缀“长”。从构词法，甚至从词义看，均极相似。只是因为日语中用“会社”表示公司，于是就产生了两个词同型，但却不同义的差异。这正是中日两种语言“同文”所造成的结果。但这往往会给学生在使用上造成混乱。笔者十余年前在某大学教授“时事商务中国语”课程时，布置学生练习书写商务信函。其中就出现有学生将某公司负责人冠之以“社长”，或将某出版社社长称作“总经理”之现象。前者是将日语中的汉语词取来直接用，后者则是忽略了汉语称谓词的多样性及特定性。这正是在日本教授汉语时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所以授课者应针对这种特色，重点分析“经理”“社长”一类词的“形似”和“神异”，让学生能领会其本质，准确使用。

5. “老板”与“老总”新义

“老板”本为对私营工商业财产所有者的口语称谓词。随着中国一度时期私有制度的消失，此称谓词曾废置不用。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私营企业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老板”自然又被恢复使用。不仅如此，现在“老板”还常被某些人用来称呼自己的顶头上司，如一些硕博士生就多在背后将自己的指导教师叫作“老板”，有某一方面负责人的意思。这个冬眠了近四十年之后又重新起用的称谓形式，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老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1949年以前称国民党官兵为“老总”；解放以后又多用以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高级将领。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又俗称公司的总经理为“老总”或“某总”，而且颇有流行开去之迹象。

类似以上“老板”“老总”等词的口语新用之义，辞书皆难以及时反映。特别是日本出版的一些词典，更难查到这样的新用法。这就需要教师的指导，要帮助学生学会“活用”。

6. “爱人”的误区

“爱人”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称谓词，原指情人、恋人。其配偶义于二三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出现，在党内称呼那些为共同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革命

伴侣，有“相亲相爱”和“最亲爱”的字面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所以“爱人”可用于互称夫妇双方。这种用法，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扩展到全国，^{vii}“横扫”了解放前上层社会流行的“老爷”“太太”等夫妇称谓，也缩小了一些对妇女有歧视色彩的称呼（如“屋里的”“糟糠”“贱内”）的使用范围。

含配偶义的“爱人”，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其“革命伴侣”之义实已淡化，成为一个指称夫妇关系的最常用的普通称谓词，其“相亲相爱”和“最亲爱”的字面意义也已不像早期那么强调和突出。一对可能即将离婚的夫妇，在没有解除夫妻关系之前，仍属于“爱人”关系。而近三十余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受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还保留于海外华人社区的“先生”“太太”“夫人”等旧称又多有回归，而且逐渐流行。夫妇关系，文雅则以“先生”“太太”“夫人”等称之，随便乃用“老公”“老婆”呼之。相对来说，“爱人”的使用频率近年来实际上已有所下降。

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也有称谓词“爱人”，不过不指夫妇，而表示情人，且多带有贬义。然而，日本人学习汉语，却能比较快地认同这个词，尤其是女性。这是因为：①人们追求其字面意义“相亲相爱”。②是对日本男尊女卑文化背景的一种下意识抵抗。日语中的夫妇称谓，则是这种文化背景的直接展现。例如，日语称“丈夫”，无论是对他人言及，还是称她人之夫，都可用“主人”这个汉字词，区别只在于后者在“主人”前用一个表示尊敬的敬语词头“ご”。而称“妻子”，最常用的有如“奥さん”（尊称他人之妻）和“家内”（对他人提起自己妻子的谦称）。而“爱人”则彻底消除了这种区别，所以这个称谓词在学汉语的日本成年人中颇为流行。然而，如上所言，“爱人”之称在中国实际上已悄然有所变化。一般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圈子已较为少用。但这种变化却难以在教科书中体现出来。所以日本学生能很快学会此词，但若理不清“爱人”的起源和发展线索，很可能说出的汉语就不自然，不地道。

7. “姑”与“娘”的倒置

“姑”用以称丈夫的母亲，即现在的“婆婆”，汉语自古就有。据《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清·郝懿行疏曰：“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称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viii}这个意思还留存在日语里。但是，“姑”在古汉语中还可作为妇女的通称，“姑子”可用以指未婚女子，如《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二·欢好曲》：“淑女总角时，唤作小姑子。”

“娘”在中国古代，主要指称年轻女子。《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四·黄竹子歌》：“一船使两桨，得娘还故乡。”唐·晁采《子夜歌》之六：“寄语闺中娘，颜色不常好。”《称谓录》卷六就有“细娘”和“小娘子”条用作女儿称的。相对来说，用“娘”称母亲，已经比较晚，而且开始作“孃”，近代汉语才出现。但是现代汉语中，“娘”主要用于称母亲或年长的妇女。

日语里有“娘”，还是称女儿，这是古汉语的留存。一般的教科书在提到父母之称时，都只用最通行的“爸爸”“妈妈”。学生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爹”“娘”这样带有一定方言色彩，但使用范围却不窄的称呼。所以往往在实际运用中，因受日语的干扰，影响交际效果。另外，因为受“姑”的影响，日本人在学习“姑娘”这一词时，也常会产生一些概念上的误差，将其理解为称呼中年妇女用。所以在教授这一组称呼时，特别是对把汉语作为专业或第一外语的学生，要从纵横两方面（即历史的，区域的）进行文化导入。有了这个环节，日本学生不但不会受母语的影响，反而能加深对词义内涵的理解。

8. “兄”与“姊”的对象

日本人喜欢称年轻男女为“兄”“姊”，即“哥哥”“姐姐”。如果我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让自己的孩子称呼来作客的日本朋友为“叔叔”“阿姨”，他们可能会不习惯，甚至会引起不高兴。这既有心理上的差异，也与文化背景有关。中国人长期受封建宗法制度影响，讲究辈分，只要是父母的朋友，子女多取长一辈称呼，以示尊敬，即使有时对方年龄比自己并大不了多少。“叔叔”“阿姨”是用得最多的。而日本人却并不习惯接受这种辈分的约束，以年轻为走俏。很多

老年人也多在公共场合用“哥哥（兄）”“姐姐（姊）”称呼年轻人。所以在教授这组词时，应该把这种心理差异也同时告诉学生，使他们既能愉快地接受被称为“叔叔”“阿姨”，也能准确地使用“哥哥”“姐姐”。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词汇作为语言要素之一，又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它能够最大限度、最密切、最敏感、最迅速地折射出社会文化发展的镜像。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灿烂的华夏文化与浩如烟海的汉语词汇的密切关系，如何有机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使更多的非汉语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词汇的同时，也能发现和体会汉语词义的深层内涵，这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我们认为：掌握了语法规则和语音体系只是对习得语言具备了基本运用的原则，如果想进一步地理解和驾驭就非得从文化内涵入手不可。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与中国都有着多少不同的差异，对他们来说，理解语言背后的东西，就不但能避免许多语言上的失误，更为准确地把握和运用，还能有助于对习得语言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我们用以上一组汉语称谓词为例，主要想说明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导入的重要性。虽然中日两国文化有“同型”，语言“同文”之特征，但两个不同国家都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风土人情与生活习俗都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中日两种语言的词汇意义系统中。所以我们在教授有关汉语称谓词时，除了一般讲解，还要从两国的交际习惯及语言形式中伦理文化和情感原则及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教日本学生与欧美国家的学生不同。中日两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中日两国称谓系统的同异，特别是同用汉字书写的称谓词，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背景，都需要我们在授课时适当导入，尽可能讲解清楚，这样才能使学生用汉语进行实际交流时，有一个成功的开端，因为开口叫人是言语交际活动中的第一关。

ⁱ 李树新,〈现代汉语称谓词与中国传统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3期。

ⁱⁱ 《称谓录》,清代梁章钊撰。共32卷,上至皇家官署,下至三教九流、三姑六婆之称,无不收入,乃今存最完备之古代称谓辞典。

ⁱⁱⁱ 《张洁文集》(1997)第三卷,1页-182页,约十余万字。(北京:作家出版社)。

^{iv} 唐·韩愈《师说》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v 参考丁安仪《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称谓》。第六届国际对外汉语教学学术讨论会论文,1999年8月德国汉诺威。

^{vi} 参考丁安仪《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称谓》。

^{vii} 参考陈建民《配偶义的“爱人”小考》;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总第13期。1997年8月。

^{viii} 郝懿行(1982).《尔雅义疏》。中国书店。